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三五期 ——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3c)

【往事非烟】	父亲往事：沙甸事件	马 黑
【痛定思痛】	我们都是污点证人	顾 土
【不堪回首】	科学殿堂与人间炼狱	历史见证人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十三）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往事非烟】

父亲往事：沙甸事件

• 马 黑 •

2011年10月22号出版的英国《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邓小平的遗产”(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云南省的一个穆斯林村庄。那次行动导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个儿童。由此可知，14年后，邓小平对学生和工人游行抗议的回应（加注：64事件）完全合乎他的性格。”（“In 1975 he ordered the army to crack down on a Muslim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 an action which resulted in 1,600 deaths including those of 300 children. Deng's response to the student and worker protests 14 years later was hardly out of character.”）

文章提到的被军队镇压的云南穆斯林村庄就是沙甸。那次军队镇压云南沙甸回民的事件被称为沙甸事件。

沙甸事件，是父亲工作生涯中，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一段痛苦经历。

1973年父亲从四川三线工厂调回云南工作。1975年沙甸事件武力镇压前，他被省革委会指派，到沙甸做调查，和沙甸回民代表对话，协商。1974年底中央来电，指名父亲带领沙甸回民代表赴京办学习班，并参加当时以王洪文为首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三次见面会。武力镇压之后，又参加了对回民的安抚善后工作，父亲亲身经历见证了沙甸事件的很多发展过程。

1976年春天，我从青海回昆明探亲期间，听父亲讲述过他经历的沙甸事件。以后和父亲相处的日子里，又多次听他讲述有关事件的一些回忆。现在觉得有必要把父亲的讲述写下来，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里，算是个历史记录。

◇ 历史背景

沙甸，是位于滇南个旧地区的一个有7、8千人左右的回民聚居村庄。

沙甸事件，是由文革中派性斗争发展最后导致严重的民族冲突。

文革初期，云南的造反派分成两派，八派和炮派。1968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八派上台炮派受压。沙甸回民大部分属于炮派，因为人多势重，比较顽固强悍，不买八派控制的当地革委会的帐，当时滇南地区同属炮派，受到打击迫害的500多人，跑到沙甸来避难，当地八派主导的革委会随即派出以军人为主，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庞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沙甸，号称捅马蜂窝，搞所谓“划线站队”，批判“反军乱军黑干将”。军宣队进村后，就直接住在清真寺内。这本来只是文革中常见的派性斗争，但因为沙甸炮派都是回民，这种斗争发展到极端时，八派开始以侮辱民族侮辱宗教的方式进行，比如强迫被批斗者学猪叫，学猪拱，甚至把工作队吃过的猪骨头丢到水井里等等，派性斗争开始朝民族冲突转变。

◇ 沙甸事件中，革委会和沙甸回民冲突焦点是清真寺是否开放的问题

从文革初期破四旧开始，沙甸的清真寺就被关闭了。1971年“913”事件后，沙甸回民开始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开放清真寺，让回民进入清真寺做礼拜。但没有得到解决。

1973年10月，沙甸回民自行打开被封闭的清真寺做礼拜。消息传出，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有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近百人工作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回民到清真寺做礼拜。回民绕道进去，工作队即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并说“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联系当地实际，沙甸这样的回民地区就变成了批判可兰经，关闭清真寺。

父亲回忆：“当时省革委负责人执行‘四人帮’路线，派大批工作队到沙甸搞‘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宗教，粗暴干涉回民宗教活动，强行关闭清真寺。省革委主任周兴讲：‘他们（回民）打开一万次，你们（指工作队）要关闭一万零一次。’由于强行阻止回民进清真寺，引起了冲突。有人上京告状。王洪文批示：‘云南此类事件不少，希望周兴同志亲自抓一抓’”

◇ 北京来电

为了镇压遏制沙甸回民的反抗，当地革委会政府，在临近沙甸的鸡街建立了专门对付沙甸

的民兵指挥部，沙甸也以原有的民兵武装为基础，并抢夺附近武装部的枪支，相应建立了民兵团以对抗。两边冲突不断，互有死伤。

1974年底，中央来电，点名由父亲带领沙甸回民代表上北京解决问题。这封电报被省革委印成传单，在昆明市及全省到处张贴散发。我记得母亲当年这样讲过：“你爸爸在云南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这样出名，他的名字随着中央来电被到处张贴散发。”

1975年元旦之夜，父亲和另外一个汉族干部带领沙甸回民10个代表，登上中央派来接人的三叉戟专机，当夜飞到北京，住进国务院招待所。

中央来电上面，父亲的名字排在前面。到北京后，带队干部的名字做调整，父亲的名字被排后面。大家都知道，在共产党的体制里，排名顺序非常重要。父亲说：“我知道，他们对我犯疑心了。”父亲还说，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周兴问过父亲多次：“你是哪里的回民啊？”父亲回答是滇东北昭通的（沙甸是滇南）。从周的多次问话中，父亲感觉到一种不信任，好像是在探寻父亲和滇南那边的回民有无什么关联

云南回民分为滇东北，滇西，滇南3块，历史上大多是作为军人从北方而来。第一次，元朝时期随蒙古军队进入云南。第二次，明朝初年随蓝玉、沐英征战云南，剿灭元末残余小梁王。根据家乡石碑记载，我的祖先就是第二次时，征战云南明王朝军队中的一员。回民一般比较彪悍，而云南回民因为先祖的军人历史传统，更加彪悍，最有名的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杜文秀造反。那次造反主力是滇西回民。有意思的是，沙甸所在的滇南回民在那次造反中，被清王朝招安，是镇压杜文秀为首的滇西造反回民的急先锋。滇东北回民也参加造反，老家那个村子因为造反被屠村，死了上千人，不过并没有和杜文秀的造反回民连成一片。

因为名字排序调整和周兴多次问话，父亲开始很小心了，所有和回民代表的交涉开会，父亲一定等到那位汉族干部在场才做，自己绝不敢单独和回民代表接触。

父亲虽是抗战初期参加共产党的干部，一直也自认为对党忠心，但在这种民族关系高度敏感紧张时刻，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共产党内还是起主导作用。共产主义原教旨本来讲“工人没有祖国”，“无产者没有民族性”，但实际上不论是前苏联还是49年后的中国，实际做的完全相反，虽然同为共产党人，少数民族的共产党人在政治上，要比汉族共产党人多一个小心：要时刻提防被戴上“叛国”“独立”“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

父亲回忆：“1974年12月，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和XX带领10个回民代表上京，在飞机上看到省州市有关负责人和两派头头都来了。到北京后一起开会学习，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参加的人有王洪文、吴桂贤、苏振华、陈锡联、纪登奎。中央宣布派红河州委书记冯治国和回民代表马绍美回红河收缴枪支。王洪文在会上讲“如果不听就要打土围子”。到第三次传达26号文件精神，就说要“实行军事包围，如不欢迎解放军进村，就采取军事解决”。要参加会议的每个人表态。我被指定发言。由于初到北京时我的排名在XX之前，后来我的排名就靠后了。由此使我产生了疑虑，不敢再与回民代表私下接触，和回民代表开会时要有统战部的人参加。因此，在这次会上我的表态十分慎重，主张劝说回民欢迎解放军进村。”

父亲对我说过，他在王洪文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们的接见会上的发言，除了谈到要欢迎解放军进村外，还讲了这样一个家乡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奶奶也讲过）：19世纪50—60年代，云南滇西发生了杜文秀回民起义，老家滇东北地区回汉关系也高度紧张。有一天，一头疯牛突然跑到了昭通城里最热闹的陡街上，街道上有人为了躲避疯牛，就开始奔跑，这一奔跑，造成了恐慌，有人看见别人跑自己也跟着跑，这时听见有人边跑边喊：“回子造反了！回子造反

了!”。一下子回民和汉民都各自回家拿出刀枪开始互相砍杀起来，一个疯牛奔跑，就这样毫无理由地引发一场残酷的民族仇杀。父亲给政治局委员们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民族关系要长期经营和维护，如果不注意做长期维护的工作，到了民族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候，一点点无关的小事，都可能触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

父亲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和昆明血案后，广州最近发生的地铁践踏事故有相似之处？

父亲回忆：“中央工作组组长袁木（注：就是64后那个国务院发言人）找我谈话，我给他讲了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特点，还讲了伊斯兰教的“五功”等，希望他正确理解回族和伊斯兰教，他问我对宗教的态度，我用马克思和毛主席对宗教的论述来回答他，意在说明信教或不信教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应由人民群众自己去决定，别人不能“代庖”。他说：“那么你是反对他们的做法（指关闭清真寺，不让回民做礼拜）？”即然他已挑明，我就不作解释了。”

◇ 武装镇压

回民代表回到云南后，他们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省里都同意了，最后最大的一个争议集中在清真寺的关闭问题。沙甸回民要求政府答应，解放军进驻沙甸后不要关闭清真寺，但政府对此事不表态。父亲说，周兴很多问题都让步了，但就是对此事不表态，而此事也正是沙甸回民最在乎的问题。

因为政府不答应解放军进村后不关闭清真寺，沙甸回民就不让军队进村，最后就是武力解决了。

执行武力镇压的是14军，也就是后来的14集团军，有近万人。昆明军区由副司令员刘春山指挥。军队先是武装包围村子，和沙甸回民武装形成对峙局面，1975年7月29日凌晨突然开打。父亲说因为是军事行动，地方干部完全不知情。父亲估计可能连周兴都不太清楚军队的进攻行动，就算知道，也可能最后一刻才知道。那是从中央军委，总参，到军区，再到14军的军事行动命令，邓小平时任总参谋长。

镇压过程非常惨烈。解放军开始采用穿插分割传统战法，凌晨先派一支精干部队（当时听说是个侦察连，最近听有人说是一个侦察排。）在一个副团长亲自带领下，偷偷潜入村子，想把沙甸分割成几块，再一块一块吃掉。但是沙甸回民武装警惕性非常高，发现部队进村偷袭。立即全民动员，打起人民战争。部队因为在文革中搞政治学习太多，战斗素质不强，加上地形不熟，穿插分割失败，副团长被打死，偷袭部队几乎被全歼。这一下子震动了沙甸前线指挥部。最后为了最大限度保护部队避免牺牲，尽快结束军事行动，采取了最极端最容易的方法：调集炮兵部队（据说是个炮兵师），用炮地毯式轰平整个沙甸村。沙甸回民武装赖以抵抗的工事，只是普通农村民房建筑，勉强挡得住子弹，在炮火攻击面前，完全不堪一击，整个村子被炮火夷为平地，战死的沙甸回民绝大部分丧生于炮火之中。周兴在沙甸前线目睹部队和回民都死了很多人，心中着急，自认为责任重大，当场病倒不起，当年10月病逝于北京。

当时听到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其一是，炮火轰平村子后，回民武装完全丧失抵抗力，剩下没死的也都身受重伤。部队进村后，开始施行优待俘虏政策。有个战士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腿被炮火打断躺在地上，就把孩子背起来，想把他送到战地医院去救治。这个孩子在战士背上一声不吭，拉响了战士屁股后面挂着的手榴弹，两个人同归于尽。其二是，军事行动结束后，逃到村外避难的一些老弱妇幼，被允许回来收拾处理亲人遗体 and 成为废墟的家园，据说她们没有哭泣，脸上毫无表情。在场观望者说：“这些人太可怕了，她们要是哭泣，到还不害怕，居然面无表情，冷漠以对，让人不寒而栗。”

父亲回忆：“最后中央决定回民代表回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金冶敏要我跟他一起到沙甸工作队，我拒绝了……。7月中旬，看到由周兴签名的一个命令写着‘XXX（父亲）带50人于16点30分到沙甸，不到追究责任。’我只得遵命按时到达，加入了工作队，我声明患有周期性瘫痪病，需要单独生活，没有与工作队住在一起。后来我问红河州委书记，‘周政委要我来，究竟要我干什么？’他叫我直接去问周兴，后来通过李文传话说：‘XXX（父亲）不能走，就在沙甸’。但决定开战，并把沙甸定为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样的大事，事前并不让我知道，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战斗打响后，又要我表态，我只好向受难群众讲：‘你们应该欢迎解放军进村不就没事了。不该修工事设防对抗解放军。’其他只能照本宣科。8月9日接到xxx来信，说：‘估计你有许多困难，也会有些意见，但不管怎样，以大局为重，以完成艰巨繁重的政治任务为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上。你是回族领导同志，做起工作来有利于发挥更大作用。’我看后，心里不是滋味。后接省委通知，要我带着50人先回昆明，再到文山去。到了文山让我当回民工作队队长，主要任务是所谓‘平叛’善后工作，安排群众生产、生活，盖房子。做安定团结工作。我们先到茂克大队，发现有些回民逃跑了，有的被抓去劳改，有的办学习班。在学习班把地主分子与群众放在一起学习，要我去讲话，我说你们把地主分开。我主要讲了如果欢迎解放军进村，不采取对抗就没事了。后来到小石桥，那里支部书记坚持欢迎解放军进村，避免了灾难，丘北县的河边、旧城、日若三个回民村同样欢迎解放军而没事。”

父亲谈到，因为他在沙甸事件中的表现，沙甸军事镇压后，省委某常委曾在常委会上提出要处分他，不过别的常委听到这个提议后都不表态，父亲才没有被整，此事是另外一个和父亲关系比较好的常委私下透露给父亲的。

父亲说过多次，当时如果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结局可能会比较好。滇南有好几个回民村落，就是采用围而不打的办法，耐心做工作，最后让解放军进了村，避免了双方的流血。对沙甸进行军事镇压的决策者们可能这样想：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的地界上，没有进不去的地方，小小沙甸居然胆敢不让解放军进村，反了！再等下去就是示弱，不狠狠镇压，军威何在？可是从沙甸回民的角度看，他们捍卫的是宪法保障的宗教信仰权。即使是中国1975年年初通过的最左的宪法也有这样的规定：“第二十八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打开清真寺做礼拜，是最基本的信仰宗教的自由。当然在中国，党从来都高于宪法，军队是党的军队，以宪法来对抗解放军，是反党反军，必遭镇压。

沙甸镇压后政府进行的宣传中，沙甸回民有条罪状是企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我当时问过父亲，他说那不是事实。父亲说他们就是拿了沙甸村里发现的一面有可兰经文在上面的旗子作为证据，其实那只是个宗教含义的旗子，根本没有什么独立建国的意思。想想也是不可能，那么一个小村子，周围都是汉族村庄，想独立建国？简直是笑话。如果想独立建国，那他们为什么还一直不断地上访，最后到北京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什么当时政府要如此宣传，原因很简单，死了这么多人，必须最大限度使军事镇压合理化正义化。只要被戴上叛国分裂祖国的帽子，就罪该万死，没有任何人会同情。

最近看到网上有文章说，沙甸事件起因，是一个排手无寸铁的解放军进入沙甸去做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结果全部被割喉杀害，解放军才被迫用炮火消灭回民武装，这也是个不实的说法。第一，当时我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此事，我最近问母亲，她也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第二，当时政府有个沙甸平叛宣传提纲，里面列举了30大罪状，但却没有这条罪状。如果沙甸回民真的割喉杀害了一个排手无寸铁的解放军，罪状中应该明确列出这一条，这为军事镇压提供了强有力证据。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政治宣传效果的威力，如果这样的罪行是真的，绝无可能把这么重要的情况隐去完全不提。沙甸回民武装是打死了一个小分队的解放

军，不过那不是手无寸铁，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只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军人，而是全副武装凌晨潜入村子打分割穿插的侦察部队。

关于军队这方的死亡人数，维基百科说，军方死亡人数为130多人，这正好是一个连的兵力人数。猛烈炮火攻击后，沙甸回民武装基本没有抵抗，军队自此以后应该没有更多伤亡，所以军队战死的人员，应该是凌晨潜入村子，被回民武装歼灭的那支打穿插分割的小分队。这么看来，我当时听到小分队是一个连的可能性很大。

我记得父亲母亲当时讲述沙甸事件时，还有如下评论：

禁止和消灭宗教，反宗教，限制宗教，都非常愚蠢。宗教，那可是有上千年历史的信仰，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人，信奉了那么长时间，那种精神力量有多大，你怎么可能禁止反对得了。你越禁止，它就越反抗，他的信徒就越信，越有市场，传播得越快。宗教当然也可能消亡，但那应该是个自然的过程，精神的力量只能被另外一种精神的力量去征服，从而走向消亡。任何外力想去消灭宗教的做法都不可能成功。共产主义作为人类一种信仰，不过百多年历史，怎么有人可以如此不自量力，如此狂妄，居然要向宗教宣战。伊斯兰教创始人穆哈默德的形象是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可兰经，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你要灭它，它一定挥起宝剑和你拼一死活。

◇ 安抚平反和后续影响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沙甸事件被平反。

父亲回忆：“1977年我组织滇西、滇东北回民参观团，我在参观团学习会上讲了对沙甸事件的看法：‘文革中两派背离了大联合的指示，背离了毛主席安定团结的方针，搞两派斗争，进行批林批孔批宗教，关闭清真寺，回民则要求开放清真寺，形成用枪杆子去互斗，发展到军事包围；有的村欢迎解放军进村就没事，有的持枪挖工事对抗，以致军事解决，使人民和国家均遭到重大损失。后经善后工作，国家拨巨款重建家园，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才逐渐恢复。沙甸事件是局部问题，昆明及滇西、曲靖、昭通等地就没有发生冲击宗教问题。这些地区的回民村寨都平静无事。’我讲这段话的意思主要说明沙甸事件不是‘反革命武装叛乱’（尽管当时沙甸事件尚未平反），而是‘两派斗争’所引起的。1979年省委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沙甸事件平反问题，我发言表态赞成平反。在平反具体工作中，由于有少数回民对我的工作有些误解，我没有参加平反的全过程。但在平反工作结束，省委办公厅写出准备报送中央的《沙甸事件平反工作总结报告》送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平反工作是好的，我表示同意，并签了名。”

关于沙甸事件的责任，中央下发平反文件中归咎于四人帮，其实邓小平也牵涉其中负有责任。他当时是总参谋长，沙甸军事镇压的命令一定是他下达。他当时大力提倡“整顿”，“打土围子”，这种镇压符合他的主张。父亲说过多次，“邓小平怎么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他还讲了‘不打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我都记在笔记本上。”。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邓小平讲此话，我没有追问。我估计是沙甸军事镇压后，传达中央领导讲话时记录下来的。父亲过世后，留下很多笔记本，都放在家里一个大柜子里，下次回家有空好好去翻翻看，不过父亲的字相当潦草，很难认。

谈到64事件，父亲常会这样说：“我早知道会有那样的结局，你们不了解他（邓），他敢下手而且一下手就很重。”。像父亲这种层级的地方干部，不可能和邓有多少接触。我读过父亲的回忆录，他和邓最近距离接触，是1951年4月在北京参加完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返回云南路上，先和云南代表团一起飞抵重庆，受到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接见并聆听

他的讲话。父亲关于邓和64的评论，估计就是基于沙甸事件中的经历了。

沙甸事件平反后，政府给与很多特殊优惠政策和巨大的资金扶持，帮助重建家园，沙甸经济发展很快，在当地成为一个相当富裕的村子。每届省政协副主席中，必定有一个来自沙甸。因为那是一个曾公然武装对抗政府和解放军，并为此付出上千人生命的村子，沙甸这个名字在云南有点让人生畏。

1996年我回国时，姐姐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她几天前在昆明乘出租车，上车后司机就对她讲：“唉，刚才真倒霉，我的车和另一个小货车擦撞了，是对方的责任。我下车想找他理论求赔偿，发现对方是沙甸的回民，吓得我赶紧躲开，自认倒霉算了”。

沙甸事件，也使云南的各级政府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对任何牵涉到回民的问题，非常小心，非常慎重，觉得是个烫手山芋非常棘手，尽可能回避躲开。

我老家那个村子在滇东北地区回民中很有名，清朝咸丰年间有过和沙甸同样的经历：也是个7、8千人的村庄，武装对抗清朝军队的围剿，最后被屠村，被杀的人数和沙甸事件中的1600人很相近，史料记载，破村战斗中，“共毙回匪7百多名”，破村后，“设杀场于村后之丁家湾，……。每次杀十人，共杀八百多人”。上世纪90年代，为反抗计划生育政策，该村领头联合周围回民村落一共几千人，打进县城砸了计生委办公室。此事以后不了了之，政府不敢处理，计划生育再也不敢管那里的回民村落。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是沙甸事件的阴影，还深深留在政府官员们的心中。

沙甸事件平反以后，回民中一些不良极端分子，利用政府对沙甸事件后怕再出事的畏惧心理，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猖狂至极，最后发展到顶峰，就有了90年代初的平远街事件。平远街，是位于滇南文山州的一个回民聚集区。从80年代开始，直到90年代初，那里成了一个法外之地，疯狂贩卖毒品，私自拥有并贩卖军火，欺负相邻其他民族人民，各级政府都不敢管。去年回国，一个当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那时联合国有一个项目，同学被指派到平远街去谈，劝说当地参加这个项目，使生活走上正途。去的时候，同学由两个全副武装的武警跟着保护，如同进入匪区，进镇子后，正赶上伊斯兰教的一个宗教节日，满街贴着悼念沙甸为主为教殉难烈士的标语。同学没能说服他们，那里搞非法生意赚钱赚疯了，根本不为同学的建议所动。以后上级政府实在忍无可忍，终于下定决心，出动2000武警，剿灭了毒贩非法武装，一举捣毁毒贩巢穴，把为首作恶之人抓起来判了刑，该杀的，该关的关，才重新恢复了正常的法制和秩序。据同学说，平远街武警开打以后，周围的彝族苗族壮族瑶族村落一片欢呼庆祝之声，大家自发地在村里把家里的碗盆锄头镰刀拿出来敲打，高声大喊：“灭回子了！灭回子了！”，由此可见，周围各族民众对平远街憎恨之深。

父亲虽然80年代初就离休了，但他对沙甸事件平反以后，政府对回民中的一些不良极端分子的违法行为过分纵容和软弱，颇有意见。父亲谈到此问题时，常会提到云南历史上清朝时期的两个人：一个是他最推崇的当过云贵总督的林则徐，林则徐处理回汉纠纷的原则是：“不分回汉，只论良莠”。就是说事情按照是非曲直对错去处理，不管回族还是汉族。父亲说这是个好的民族政策，按照这个原则，平远街那样的违法之事，政府早该果断处理。另外一个人是当过云南巡抚的舒兴阿，他处理回汉纠纷的做法是，“奉宪灭回，净剿回子八百里”，那是杀杀杀的民族仇杀民族歧视政策，父亲说，那样的民族政策，只会加剧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分裂，一定不会成功。

这次回国在昆明期间，外甥女安排我到一個经络馆去拉筋，据说是“筋拉1寸，寿增10年”。给我做经络拉筋的齐齐老师，20多岁，汉族，云南宣威人。我和她聊天时，问她家乡有

无少数民族，她说：“基本没有，只有回族”。她反问我：“你对回族印象怎样？”我说没有什么印象。她接着说：“我们都对回族印象不好，回族太霸道，我读高中时，学校里有个回族同学，非常调皮，爱打架，是全校有名的坏学生”。我心里暗暗发笑，要是她知道我是回族，一定会很尴尬。不过这也正好说明，她说的是真心话。

◇ 今日沙甸

这次回国期间，在去元阳看梯田的路上，途经个旧时，拐到沙甸村做了短暂停留

街道建筑修建得都很漂亮，可是没有什么人和车，到处冷冷清清。为什么会这样？估计和全中国各地的农村状况一样，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做生意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弱年幼。我们中午时分开车进沙甸镇后，本来想吃顿午饭，可是很多餐馆虽然挂着牌子，但却关着门。有个餐馆开着门，进去后，没有人吃饭，也没有人出来打招呼，问了一个路人，他告诉我们村边有个餐馆可以吃饭，我们到了村边后，才找到餐馆吃上饭。

紧邻沙甸的这个村叫鸡街，汉族聚集区，当年在革委员会支持下，建立的直接和沙甸对抗的鸡街民兵联合指挥部就是以这里为基地。观察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沙甸村边界地带的一条回汉杂居街道上，清真餐馆当然都会注明是清真回族餐馆，但是不少汉族餐馆的招牌上，在注明川菜山西小吃等地方风味的同时，还会加注两字：汉族。这是在其它任何地区都看不到的现象。回昆明后，就此事请教了朋友，他说应该是汉族餐馆怕回民误食了他们餐馆的菜饭后惹出事来，所以才在招牌上特加注了汉族两字。

□ 原载《万维网》

~~~~~

【痛定思痛】

我们都是污点证人

• 顾 土 •

忏悔、道歉，近来不断引起万众瞩目，尽管迟到了30多年，但有总比没有强。

罪己，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连皇帝都不例外，但在当代，却变得无比稀罕起来，遍及各省的大饥荒、大量人的非正常死亡、“冤狱遍中国、冤案堆如山”，从来都不曾见到有人公开道歉，而且还在史书中常年将人祸转嫁为天灾。因此，不管是什么人，如今只要是公开忏悔和道歉，我们都应该向他们的勇气致敬。

当听到看到别人在忏悔在道歉时，作为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们是做热心观众还是当个局外的评判者呢？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过去。

我出生于1957年，1966年正在读小学。我就读的那所学校叫北京府学胡同小学，有一批教师先后被揪斗，校长姓吴，被剃成阴阳头；王立人老师，我哥哥的班主任，被戴上军统特务的帽子；还有一位教体育的老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我的班主任孙筱绣，举止温文尔雅，对待我们永远充满了慈爱，没想到连她也被批判，因为她的父亲是孙良诚。在学校里，被批斗次数最多也是最残酷的是田静一老师，大约快50岁了，以前她从未教过我，但我却在学校礼堂参加过多次批斗她的大会。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级同学按着头，反拧着胳膊，“坐喷气式”，一斗就是两三个小时。她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房东，她的邻居还专门赶到学校登台控



诉她，说她进行阶级报复，和一家工人邻居吵架，让邻居家的媳妇流了产。我们这些小學生听到田老师的“罪行”后，无不义愤填膺。我还被班级选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师。那次批判会，我脚穿翻毛皮鞋，说到激愤处，猛一跺脚，吓得田老师向后一闪，以为我会踹她。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一跺脚，我至今难忘，深深自责。

贫寒之家出身的祖母，因为嫁给了我的祖父，1950年就被定为地主成份。1966年，红卫兵将“勒令”贴到了我家门口，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铁一号大门口，与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一起受批斗，浑身沾满路人的吐沫，还有人不停地向他们身上扔石头，常常被砸得头破血流，最后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临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阴阳头，不得不在头上裹着条头巾，正好我放学回家，在路上遇见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见我就大声喊我的小名，而我却远远躲着她，不敢上前。没想到这一喊，竟成永诀，她回到上海嘉定娄塘老家后不久，尸体就漂浮在池塘里。当时公安局来电称“畏罪自杀”，可上世纪80年代我去嘉定，当地检察院却告诉我有可能是他杀，真相一直难辨。一想起她临行前的凄惨目光，我就悔恨不已。

我的母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1966年也在劫难逃，先被关押，后又送水泥厂劳动。1969年在下放江西的前夕，军代表和我母亲的一个学生忽然来到我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那个女学生个头很高，其父是军级干部，所以披件军大衣，趾高气昂。她高声要求我们帮助母亲找出问题，认清历史，端正态度。幸亏我那时没有犯傻，最终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母亲，否则会悔恨一生。而我家邻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岁，其父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一天，红卫兵将他的父亲揪来游斗。他的父亲低着头，戴着纸糊的高帽，边走边敲锣，喊“我是黑帮”；而他，则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嘴不断里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此情此景，恐怕我终身不忘。

在我居住的那个大院里还有一家，父母分为两派，姐妹二人各随一派，天天家里争吵不休，互相揭发批判，都自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另有一家兄妹，其父将其母的日记贴到院子里，其母又反过来揭发其父，他们夹在中间，受尽人们的羞辱。

1971年，我回到北京后，在165中学上学，这是一所百年老校，拥有一批留美留日和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的老师，所以，历史问题也就成为很多教师不得不承受的“污点”。我刚进学校时，一位老太太天天戴着大口罩在扫厕所，别人都说她是日本特务，等到我读高一时，她重新走上讲台，这才知道她是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刘老师回到讲堂以后还遗留着“特嫌”尾巴，同学们因此不把她放在眼里，尽管她的教学水平很高，所有的难题在她那里无不豁然开朗，可惜，全班没有几人听讲，多数人都在那里聊天、打闹，她只得哀求：“求求你们啦，听我说啊！”

文革自始至终都是晚辈揭发长辈，学生批斗老师，经过10多年的斗争洗礼，敬老、尊师、百行孝为先，所有的传统道德终于被悉数扫荡一净。

别看我只是个学生、未成年人，但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事情却没少干，从批判刘少奇到林彪，从批判孔老二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从批判老师到同学，整整批了10多年。物理老师唐润和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为他没有历史问题，所以敢于维护课堂纪律，被人称作“唐大炮”。在学习黄帅、学习张铁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日子里，我们都被要求贴出大字报批判老师，我就违心地写了一张《令人发指的教育》，文中直指唐老师。这张大字报，是我在中学的一个污点。我还写过批判同学的发言稿、黑板报，批判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他们阶级斗争意识不强。有位沈振山同学，因为穿了一双皮鞋，并且擦得锃亮，就被我在黑板报上点了名。中学毕业后我去农村插队，其实，那时根本不能称之为毕业，考试形同虚设、不听听课无所谓，很多人连人民日报也念不下来，许多人连一封家书都不知如何写，

于是，在农村，写批判稿这样的任务又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写了不少，批判同村的插队青年，批判邓小平，并被送到县里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在学习班可以挣满分，还可以吃肉和白面馒头。

文革10多年，那个时代究竟有多少人是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但据我的经历，我敢断言，我们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只是程度不同、责任不同罢了。其实，何止是文革，历次政治运动，哪次不是人人过关？哪回不是个个沾了一身的污泥浊水？

妓院出来的人，还有干净的吗？文革结束，当举国都在声讨四人帮，将一切罪行统统归结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一位长辈忽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多少年过去了，言犹在耳。

的确，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我们同样也需要忏悔和道歉。

□ 原载《共识网》

~~~~~

【不堪回首】

科学殿堂与人间炼狱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文革中的血腥经历

• 历史见证人 •

——谨将此文献给因不堪忍受文革中残酷的精神折磨，而在实验室内吞食水银后上吊自尽的同事汤济宏先生

◇ 文革的独裁和法西斯本质，文革还在继续毒害着中国人

二十世纪是一个独裁和极权运动频出的世纪。其中尤以上半世纪希特勒纳粹在德国和欧洲的横行，和二十世纪下半期毛泽东在中国一手导演的文革，影响最大，破坏最烈。仔细比较这两个前后出现的独裁运动，人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诸多相似之处。

一，这两个独裁和极权运动都从造神而兴起。翻开德国历史的这一页，我们可以从当年的电影，书刊和图片中看到那一次次的大型集会，游行，阅兵。在群众和旗帜的海洋中，响彻云霄的“希特勒万岁！”呐喊声，伴随着整齐划一的举手礼，显示希特勒众望所归的领袖形象。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赫斯振臂高呼“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一位以吹捧纳粹而闻名的女导演称“希特勒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每个经历文革的中国人都可清楚地回忆起，1966年文革兴起时，天安门广场上一次次的盛大接见。城楼上林彪、周恩来举着“红宝书”，一次次声嘶力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广场上红旗招展。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朝圣的百万红卫兵们，齐手挥动人手一本的“红宝书”，构成一波又一波红色的海洋。每当毛泽东出现在城楼上向众人挥手时，广场上更是万岁声响彻云霄。那些发了疯似的人们情不自禁地向前拥动，很多人激动得涕泪横流。林彪对毛的神化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肉麻地提出向毛的“三忠于”（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四无限”（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

二，希特勒善于利用青年人为他的独裁运动打头阵。从德国当年的记录影片中，可见到佩

戴纳粹臂章的青年军，冲进犹太人家中大肆打砸抢的镜头。他们更遍设有进无出的集中营，关押并消灭了百万计的犹太人和战场上的俘虏，实行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也同样利用好斗的青年学生，作为他在全中国制造恐怖的工具。每个文革过来人都可清楚的回忆起那些头戴军帽，佩戴红卫兵臂章，手中挥舞大铜头皮带的男女红卫兵们，横行在全国各地的情景。他们在毛的指挥下，将一个个“走资派”，“黑五类”，“反动权威”们任意抽打，虐待，侮辱，批斗。在红卫兵兴起的1966年8月和9月，仅北京一地就有1700多人被红卫兵们活活打死。以破四旧为名，红卫兵可任意进入千家万户，一阵打砸，将一切书籍，文物，收藏都以“资产阶级毒草”而任意破坏甚至付之一炬。短短几个月的红卫兵横行，使中国的大部分古建筑和文物都遭受严重破坏，犹如经历了一场战争。

长达10年的文革结束后，党国元老叶剑英曾公开承认，中国两千万人死于文革。这是继希特勒的大屠杀后，二十世纪的又一场触目惊心的反人类罪行。希特勒屠杀在战场和集中营中进行，其罪行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而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迫害和屠杀，却发生在中国的每个角落。那些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批斗会，“牛棚”和监狱中的种种酷刑，精神折磨，甚至割喉，争食受害人的心肝等野蛮行径，至今仍被蓄意掩盖。

三．希特勒宣扬雅利安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为他们在国内迫害犹太人和向外扩张侵略制造依据。血统论便是毛泽东的共产党维系其一党专政的种姓论。文革中那些出身高干的红卫兵们曾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今日，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更确切地应称作“老红二代”，他们出身于党国的开国元勋家庭，他们自认为比出身于江泽民，胡锦涛等家庭的“新红二代”具有更“高贵”的红色血统）已全面接管了中国的党，政，军大权。但他们生长在闭关锁国的毛泽东黑暗统治年代，头脑中充斥的只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思想深入他们的骨髓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上台便迫不及待地参拜毛氏“神社”。

习比他的前任更蔑视人权，拒绝法治，反对民主。

四．德国犹太作家克雷普勒在其著作“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写道：希特勒，戈培尔等人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素，这种语言像很小剂量的砒霜，不知不觉中毒杀人的思考能力。这种语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即使在纳粹灭亡后，那些语言仍阴魂不散。

毛泽东，林彪发扬光大了希特勒的伎俩，从而也更深地毒害了中国人。文革自始至终充溢着狂热和极端的语言和思想。作为发动文革的准备，毛创造了大量的文革语言，为文革开道：中国赫鲁晓夫，书读的越多越蠢，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文艺黑线，反党集团，叛徒，内奸，工贼，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整整十年，这种文革语言充溢着一切报纸杂志，大字报，传单，文件中。全中国人就在这种疯狂和极端的思想和语言环境中，手捧“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揭发，批判，武斗。现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为着他们一党专政的需要，已将文革作为不可触及的“禁区”，因此这些文革语言还在继续毒害着中国人。

40多年前的1966年，红卫兵们在文革中高喊“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40年后的今天，2014年1月22日，我们打

开被称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电子版——新浪网，可以看到很多如下的惊人大标题：

中国海军司令一句话噎死美军
中国提醒印度离纳粹远一点
美国做世界老二这是宿命
与中国作对的没有好下场
北京公开对日说出最恨之话
中国军方大动作戏耍安倍
卫星泄二炮对日恐怖部署
奥巴马吓懵：中国三千架歼六终于发威了
中央军委爆惊人决定：钓鱼岛爆高烈度战争
1月19日太原射大杀器

当今，这类气壮如牛，目空一切，杀气腾腾的“豪言壮语”，天天都在毒害着普通的中国。当年希特勒就是用这类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素，将德国人赶上了挑战世界的二次大战战场。今日中国的独裁者们继承希特勒，毛泽东的伎俩，目的为何，不是十分明显吗。

五．毛泽东发明的大字报是一件恶毒的杀人武器。从反右到文革，从对付他的“亲密战友”到普通百姓，毛泽东用大字报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大字报中充满着对人的污蔑和诽谤，更有“上纲上线”的政治大帽子。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及其恶毒的语言摧毁了不知多少人的精神防线，从而达到伤害他们的目的。毛泽东用大字报践踏人权，连希特勒都望尘莫及。

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一亿人，死于二十世纪的共产独裁运动。其中七千万人死于毛泽东之手。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的一个小小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文革中的血腥经历。

◇ “资产阶级黑染缸”

从1957年的反右到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毛泽东的一切倒行逆施，使中国的经济走向崩溃，并导致至少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面对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压力，毛不得不退居二线。但这只是他以退为攻的策略。经过几年的谋划，终于在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夺权运动——文革。在他的这场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大动乱中，上海有机所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运动一开始便处于深深的漩涡中。

文革一开始，在当时中国极端思潮的推动下，在一位新进有机所的高干子弟的策划下，召开“红五类”大会，控诉“红五类”们在有机所遭受的“歧视和迫害”，把科研工作上的科研人员和辅助人员的分工关系，变成上下人员间的压迫关系进行控诉。

在当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这位高干子弟的一张大字报特别引人注目。这张大字报秉承毛的旨意，耸人听闻和蛊惑人心地提出科学院是“资产阶级的黑染缸”。按照这份大字报，有机所的领导（黑染坊的掌柜们）理所当然成了有机所的走资派。那些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回到中国的，和从旧中央研究院留下的高研们，那些被毛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人们，便成了“黑染坊的染师”。那些经过“黑染师”们带领和培养的科研人员，成了被染黑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出身高干的大字报作者，和刚进科学院还来不及涂黑的青年学生，当然成了有机所的唯一革命力量。

由此，文革在有机所的第一轮狂涛便首先对准了所领导和高研们。上海有机所是建立在原

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基础上的老所，但原来规模很小，研究内容仅限于某些天然有机物的研究。一位于1958年来到该研究所的领导，是共产党内少见的能办些实事的人。他不但使规模很小研究单一的研究所，发展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有机化学研究所。为了推广应用研究成果，他还领导建立了一个一定规模的实验工厂。在科研管理上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了“高研指兔子，中研打兔子，实验员检兔子”的形象化科研分工。他也公开提出他愿意为科学家们服务，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甚至提出实验楼内摆些花木盆景的建议。

在“黑染缸论”作者的眼中，他当然成了典型的党内走资派。虽然文革前他已被调往有机所的上级单位，但他还是被抓回有机所，大会批，小会斗。他在有机所曾为实验操作人员，设计了一种坐着进行操作的高脚园凳。此时却成了他在有机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迫害低级人员”的物证，并让他坐在这种高凳上长时间的批斗。

在批判“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狂热中，有机所还举行全所的盛大仪式，拆除一位高研的办公室，以示彻底砸碎“资产阶级科研路线”，并高喊着“兴无灭资”的口号，烧掉另一位高研的论文集。

随着北京红卫兵在毛的指挥下窜向全国各地，文革越来越充满杀气和血腥味。有机所的大字报中也越来越多的使用上纲上线和侮辱性语言。各种各样的政治大帽子，诸如“黑帮”，“学霸”，“爬虫”，“叛国投敌分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充斥在大字报中。某些党政干部利用工作之便抛档案整人。

一位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因无法忍受大字报的无端攻击和批斗会的折磨，毅然跳楼自杀身亡，他成了有机所第一位文革牺牲者。

一位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分配到有机所工作的科研人员，因工资低于科学院毕业的研究生而有些牢骚。他的弟弟高中毕业后未考上大学，被分配在靠近九龙的农场劳动。一天深夜他弟弟与同学渡河去香港谋生。在他寄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谈了他工资待遇上的不公。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封平常的信寄出后便被公安机关截住，并转回有机所，投入了他的档案袋中。文革一开始他便被打成叛国投敌分子而遭批斗。

文革一开始，一位分管全所国防科研，并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引爆炸药研究的党员副所长，被揭发为“漏网地主分子”。他被从四清工作队揪回有机所批斗。有机所派人远到他的老家抄家。在一次批斗会上，他的妻子也被揪来有机所陪斗。一位造反派头头对她拳打脚踢，一巴掌将她打翻在地。这位副所长从中央研究院到中国科学院，为中国的有机化学事业贡献了他的大半生。但在整整十年的文革中，先是被污蔑为“地主分子”，受尽种种折磨，后更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头子”，被关在有机所私设的地牢中整整一年，受尽更多的惨无人道的折磨。

◇ “黑染缸”里的“叛徒和特务”

有机所一位从法国归国的华侨副研究员，文革一开始便被怀疑为“法国特务”而受到大字报的攻击。这位在国外从未受到过如此野蛮和激烈攻击的胆小知识分子，留下一份遗书给他妻子（也是有机所研究人员）和年幼的女儿而投黄浦江自杀。

实际上他的尸体当时便被上海打捞部门发现并以无名尸体火化，并留下了他的衣物，以备日后鉴别之用。但有机所的造反组织却认为他做贼心虚而逃跑，甚至认为他可能已“潜逃国外，叛国投敌”。因此在整个文革中不断派人外出调查他的下落，不断干扰他在中国的亲戚朋友，使

他们在文革的恐怖年中长期遭受政治压力。他的妻子的处境便更为艰难。她除必须面对因丈夫突然失踪所造成的精神压力和种种家庭困难，并长期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

直到文革结束前不久，有机所那批以怀疑为依据，先下结论，再造证据的专家们才想到他自杀的可能。直到此时，这位归国华侨副研究员被文革迫害致死冤案才得以真相大白。

共产党派往科学院的各级党政干部中，不少都是因“家庭出身问题”或“本人历史问题”而不受信任和不受重用的人。他们从党政军要害部门被撤换，下放到科学院。有机所一位科研处长，虽然他早年参加革命，但因他出身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官越做越小。文革一开始他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并在部门的几名“革命小将”的战斗组中批斗（实为虐待和体罚），继而又被怀疑为“特务”又被隔离审查。从文革一开始，除在批斗会见到他外，他几乎从群众的视线中消失，直至被他们摧残至死。

一位1964年来到有机所，不久又被调到上级单位的党委书记，文革风暴降临之初便被投入了监狱。由此人们知道，他出身破落地主家庭，但很早便参加共产党和新四军。在抗战期间的皖南事变中，他被国民党俘虏并关入上饶集中营。以后他又和难友们逃离集中营并回到新四军。

文革中他和相同情况的一批老干部一起，被打成全国闻名的“叛徒集团”。他被关入监狱后曾数次被押往有机所批斗，此时人们看到的他已是一个皮包骨头，步履蹒跚的虚弱老人。一次批斗会前他向押送人员要求些饭食，他一口气竟吃了十多只馒头。他和与他相同情况的一批人，直到毛泽东死后才重新获得自由。

上海有机所的前身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时，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人离开大陆去台湾，但大部分人留下并为共产党政权服务。在国民党败退，共产党接管前，留下的人员曾组织应变会，以保护中央研究院的财产和科研资料，也为维护留守人员和他们家属在战乱中的生活和生命安全。但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疯狂年代，这个只在历史上短时间存在为迎接解放的组织，却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

在“抓叛徒，特务的高潮”中，有机所曾派人去长春应化所进行科研协作，听到有位当年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老科学家，已经“承认”应变会是潜伏特务组织。其中有些人便如获至宝，立即回有机所成立抓特务战斗队。

前面提到的那位副所长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首选的突破口。因为文革一开始他已被打成“漏网地主分子”。他已是这批人手下的死老虎。他们当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使他承认他的“潜伏特务”身份，并让他供出他的两个老同事，一个是跟他学习有机元素分析，当年还是学徒，现已是分析技师；另一位是管理器材的老职工。很快他们三人便被作为有机所的“要犯”而被隔离审查。

初战“告捷”，当然要“乘胜直追”！

这位党员副所长负责有机所的国防科研。他也是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的手下更有一批中级研究人员和研究生。既然他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他肯定会有特务活动，也会发展更多的特务。

由此，一场“深挖严打”的“战役”在有机所开始了！

有机所全体人员被命令一个月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关在有机所内办“学习班”。经过这样一个月的“向阶级敌人战斗”，果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随着“挖掘”的深入，在五十多公尺长的一号楼地下室，用木板隔成一间间的小间，越来越多的人被关了进去。在这些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小间外，一天24小时都有人看管和监视。更有那些办案者不停地一个个提审，逼供，批斗。入夜，在大楼一角的一间有铁门的地下室内，不时传出提审者的吼叫声，被用刑者的惨叫声。他们对这位副所长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那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战斗队员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战果，甚至利用诱供，套供的卑劣手法。如果他们要这位副所长招出某人，只需在审讯室的墙上贴上一张“某某人必须老实交代”，“某某人必须低头认罪”之类的标语。让这位副所长一进审讯室便知该次审讯的目的。最后这个“特务组织”的成员竟达到一百多人。因为这些战斗队员们竟然有办法让他招供，由他经手的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的申请表，即是加入该“特务组织”的申请表。

这位副所长在长达一年的地牢中被挨打挨斗，还要违心地按着战斗队员的要求招供。最后，他被迫走上自杀的路。只因一位好心的工人发现他上吊后，及时将他救下，使他能够挨到文革结束走出地牢。

那位负责器材的老职员，也被长期关在地牢中受尽折磨，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文革后，人们见到他的两只耳朵已严重变形，这是由于在批斗他时，有人死拧他的耳朵，使组织坏死所至。

那位学徒出身的分析技师，也被长期隔离审查。隔离解除后，在一次运输卡车劳动中，从车上摔下而脑出血。由于他的“特务嫌疑”仍未被否定，受伤后医院（上海的顶级医院中山医院）对他这“牛鬼蛇神”不做仔细检查，更不给住院治疗。没几天他便留下妻子和年幼儿女而悲惨地死去。

在大抓特务的高潮中，那些战斗队员们除了这个大特务组织外，也没有忘记其它的案件。有位研究员在一个月留所学习班期间，一直要他交代里通外国的问题。他苦苦回忆思索，仍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提审者的一再提示，他终于回忆起，多年前他乘软卧火车来往于上海、北京间，他与一位波兰旅客乘同一包厢。旅途中他与那位共产党兄弟国家的乘客谈到，他对中国大跃进等问题的看法。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间的谈话都被隐藏在车内的窃听器完全记下，并送进了他的档案袋。

文革期间，中国与当时的苏联因新疆和东北边界纠纷发生武装冲突，两国间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面对苏联的强大军事机器，中国一片风声鹤唳。在林彪一号手令驱使下，全国一时忙于备战，全民动员挖地道，疏散，拉练。

笔者与一位同事被命令参加首批拉练。几十人背着背包，在冬雨绵绵，道路泥泞的上海郊区，从一个镇走到一个镇，从一个村走到一个村。一天傍晚，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准备宿营。我的同事却被从有机所来到一辆小吉普车带走了。原来他父亲单位通知有机所，他父亲是“美帝特务”，他是他父亲的同伙。在他家的阁楼上架有通讯电台。他被带回有机所的同晚，一场精心策划的斗特务会已在等待着他。斗争会后，他即便长期关入地牢，直到解除他父亲的特务嫌疑。

◇ “黑染缸”里的“现行反革命”

在毛泽东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反革命罪和反党罪是最严重的罪行。一个人不管他原来的政

治地位如何，如果被戴上这两顶帽子，他在政治上将永远不得翻身。毛泽东的手上还有着各种不同的反革命帽子。在他刚登上统治中国的宝座时，曾和共产党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而争斗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残余势力，是他首先要对付的反革命。1950年那场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本文作者脑中留下终身难忘的恐怖记忆。

1950年早春的一天下午，老师带着我们一群小学生参加附近镇上一次公审大会，以接受政治教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步行，同学们来到一座小山脚下并爬上了半山腰。坐在这座面西的小山坡上，看到山下一片开阔地上，已搭了一座木台。午后偏西的太阳斜照着台前人山人海的会场。

不久，随着一阵阵震天的口号声，十五个被审判的犯人一字排开被押上了审判台。他们每个人的背上扞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他们打着红叉叉的姓名。一位审判员逐一宣判他们的罪行。从宣判听来，他们都是国民党时代本地区的区长，乡长之类的小官员。他们一律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接着他们被押下审判台，一字排开背向会场跪在地上。他们每人背后站着一名持枪民兵。一声令下，十五支枪齐发，十五颗子弹同时射入十五人的后脑。随着枪响，雪白的脑浆高高溅起，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这个杀人场面成了本文作者永生难忘的恐怖回忆。

事后，老师告诉同学们，枪手们在子弹发射前，将子弹头用力在鞋底摩擦，擦去部分原来尖圆对称的铅质子弹头，失去平衡的子弹头发射后，以摇摆的状态射入脑壳，造成死者头脑的崩裂和脑浆的飞溅。

很多年以后，本文作者在工作中认识一位当年亲身参加过镇反的同事。据他讲，在镇反开始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抓人捕人，草草审判，立即执行。一个乡间小镇一次可以捕杀十五人，由此可以想象，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内，全国有多少人死于这种乱捕乱杀的恐怖中。

时间进到了1970年，在文革中煎熬了四年的上海有机所，又要按照上海市革委会的统一部署，进入抓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了。因为在云雾中躲了十多年的江青，在文革中显露了她的峥嵘，成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手，并将当上毛泽东共产王朝的红都女王。但她三十年代在上海滩的那段明星生活，成了她的最大心病。

文革一开始她便利用她手中的权力，对上海了解她丑恶底细的电影界，文艺界人士开刀。她派人来上海对他们秘密抄家，并将抄得的材料押送北京销毁。继而又将这些知情者们隔离关押，以便杀人灭口。但当年她的那些风流新闻都登在上海的大小报纸上，成了当年上海家喻户晓的街头新闻。因此，她还要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项政治大帽子，封住社会的口。对于即使只在私下议论过她的人，也要通过声势浩大的运动，将他们作为现行反革命挖出来，以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有机所遵照旗手的命令行动了。打手们当然也从秘密抄家开始。他们在全所选定了十多名秘密抄家对象，组成每组三到四人的行动小组，乘一个月黑天高的夜晚，同时出发直奔各抄家对象。

与前几次的战役一样，一开始他们便锁定了一位研究生，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因为文革开始前不久，这位研究生曾写信给有机所党委，述说他的家庭遭遇的土改冤案。这位研究生的家庭由于一个第三者女人的介入，父母的婚姻几近破裂。他的父亲更利用国共内战的机会，带着姘妇逃往香港，台湾。抗战胜利后，他母亲被迫带着年幼的他和弟弟回娘家与她的母亲，一位三十不到便守寡的小脚老妇人，一起生活。

在土改中，因为当时当地的村长年轻时曾对他母亲有过流氓行为，并因此而受到全体村民的严厉谴责，因而一直怀恨在心。共产党来了，他手中操有了全村的生杀大权，正是他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了。从这个村长的作为，人们又一次看到毛泽东共产政权的流氓和痞子本质。

经历过毛泽东历次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他的一贯手法都是预先下达指标，拼凑制造斗争对象。当时土改工作队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评出地主和富农，以便对上交差。就这样在村长和工作队的共谋下，通过一分为二再合二为一的伎俩，创造了一家地主，达到了他们双方的目的。

该研究生的外祖母在丈夫去世后，带着他的母亲，靠亡夫留下的几亩田地，过着寡母孤女的清苦生活。她在二十多年内依靠刺绣技术和省吃俭用，逐渐添置一些田地，因而在土改时有十八亩地。但在土改中却不顾一家四口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事实，提出他母亲是已出嫁的女儿，不能回娘家土改。因而将他外祖母一人评为地主，并将他们母子三人作为另一家，并定为分进土地的外来户。

但土改后不久，当地却又以与地主分子生活在一起的理由，又将母子三人定为地主成份。土改后，面对这一冤案，他们曾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但得到的唯一结果，却是认为他们不服改造，而招致更多的政治迫害。

来到有机所后，这位研究生错误的高估了这个科研单位领导的政治水平，给他们写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由此在文革中招来了家破人亡的悲惨结果。文革一开始，他便因“为地主家庭翻案”而遭批斗。有机所还派人到他家乡煽风点火，并将他押回原籍批斗，使这个已经在文革中惨遭逼迫的一家，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对他的母亲，一位年届五十的妇人，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暴徒们将她吊在屋梁上，用棍棒轮番往死里抽打，有的暴徒甚至把手中的棍棒打断。

面对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位在生活中饱经风霜，政治上已被共产党践踏了二十年的老妇人，毅然投河自尽。结束了她在毛泽东共产暴政下苦海无边的一生。

按照文革中那些整人者们的逻辑，这位研究生和他的一家遭遇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他一定对共产党恨之入骨，私下一定会在日记和通讯中夹有大量攻击谩骂的文字。对他进行突袭抄家，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他们磨拳擦掌，准备大打一仗，抓出一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大鱼。

当秘密抄家这只欲将他置于死地的魔掌，在朦朦黑夜中向他伸来之时，这位研究生刚巧有事外出，这就让三位战斗队员焦急地等待了几个小时。待他回到宿舍，立即明白了三个不速之客的意图，并坦然打开他的抽斗和箱子，任他们搜查。这三个不速之客唯恐漏了一片能用来加罪于他的纸片，将一切文字材料和照片席卷而去。

第二天一早，当他来到所本部，一进大门便见到用石灰水涂在水泥路上的，字体斗大的战斗大标语：打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XXX！打倒XXX反革命小集团！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显然，抓现行反革命的战斗已在有机所打响！

但奇怪的是，他走遍全所各个角落，却未能见到针对他自己的大标语。直到当天中午，才见到那位战斗队的军师的，再次批判他给所党委的那封信的大字报。从这篇炒冷饭的大字报中，这位研究生明白了，在他们的秘密抄家中，除那封信的底稿外，并未得到任何能置他于死地的炮弹。就此，欲将他置于死地的革命行动流产了。这也使他渡过了文革的最后一劫。

但另一位研究生，汤济宏先生，却不幸地因涉及外单位的所谓攻击言论，而遭受灭顶的灾难。

汤济宏先生1962年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并入有机所为研究生。这位瘦瘦的文弱书生平时总是面带笑容，从不与人争执，埋头于读书和实验研究。文革开始后他与所有研究生一起去丹阳湖军垦农场劳动一年多。回所后不久他便被卷入了这场置他于死地的运动。

案发一开始，他为了不影响家庭和年幼的女儿，只身搬至单身宿舍。从此，每天清早人们总可见的他沿着路边的围墙和篱笆，步履蹒跚的慢慢走向所本部。从早到晚在实验室内写交代。除了办案人员的审问，不能与任何人接触。周围的同事也无人敢与他接触交谈。尽管大家都知道，处于这种政治高压下的人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安慰。特别到后期，由于长期的精神折磨和孤独，精神已处于崩溃状态。

一天下午，上海市科技系统全体人员集会文化广场，动员掀起抓现行反革命的新高潮。他乘着所内无人的机会，毅然打开实验室的水银压力计，吞食水银后上吊自尽。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充其量只因朋友间议论了，毛皇帝和江泼妇之流的独裁恶行和风流新闻，而被残酷迫害致死！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本文涉及的六位文革受难者：刘复炎，汤寿梁，林文德，刘亮，汤济宏，李家珍。

◇ 结束语

大陆中国历史学家周良宵和顾菊英夫妇在他们六百万言的文革专著《疯狂，扭曲和堕落的年代》中对文革作了如下的描述，现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一切灭绝人性，蹂躏人权和仇视知识和知识份子的悖乱行为，以及歇斯底里的阶级斗争理论，都是依毛泽东的一贯理论为依据，并且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整风运动乃至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左倾顽症中积聚和发展而来。

它是中国共产党机体上致命脓疮的全面溃烂，是人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全面破灭——它也是中华民族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浩劫，既表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野蛮亵渎与毁坏，还导致传统道德的堕落和沦亡。

□ 作者投稿

~~~~~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十三）

• 孙怒涛 •

（上接zk1403a，第八章 留校任教但文革仍在继续（1968.10—1980.10），第三节 毛泽东7.28召见讲话，我的解读和思考）

4、毛泽东对蒯大富、414、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

先说对蒯大富的态度

在整个召见过程中，毛泽东对蒯大富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是震惊。毛泽东派出了三万工人去清华，并由他信得过的8341部队组织、指挥，对这次行动的结果肯定有过设想的。我想他认为两派在声势浩大的工人群众面前都会乖乖地服从。他绝对没有估计到对他一向敬仰，对中央文革惟命是从，对文革思想理解最透，对他的战略部署跟得最紧的蒯大富会武力抗拒，而且还打死了工人。所以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感到极度的震惊，他简直不相信造反派真的造反了。

接着是着急。深夜里，他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全叫起来，把五大领袖全都召过来。他要当面质问蒯大富，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召见一开始他就关心地问：“蒯大富没有来？”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泽东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后来的话题有点东拉西扯拖时间，显然是毛泽东在等着蒯大富的到来，那份迫切的心情流露得一览无遗。

疼惜得流泪。蒯大富来了，他“一下就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嚎啕大哭，边哭边告状……毛泽东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那情景，就像最疼爱的孙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一样，做爷爷的如万箭穿心般的难受。

解释和表白。毛泽东一边三番五次地向蒯大富解释“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一边多次表白“今天（召见）没有邀请414（的人来）”，“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生怕蒯大富内心对他有怨恨情绪。

批评和责骂。闯了那么大的场祸，当然要狠狠地敲打敲打蒯大富的。毛泽东批评蒯大富“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警告他“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最厉害的责骂是“蒯大富，你真蠢哪……你们井冈山很蠢……这一次你们很蠢”。连着用了三个“蠢”字，完全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口吻。

检讨和认错。要毛泽东做检讨是很难的。当着那么多中央要员的面，同时也当着几个年轻娃娃的面做检讨，更是难乎其难。但他十分罕见地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毛泽东这样放低身段主动承认“错误”，唯一的目的，我想就是为了减轻一点蒯大富的犯罪感和心理压力。

肯定和鼓气。蒯大富栽了一个大跟斗，但是不能让他失去斗志和信心。毛泽东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这些都是对他的肯定。清华联合的时候，““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退回到一年多前《四项协议》的基础上去。这都是对他的鼓气。对于蒯大富这样的学生领袖，毛泽东认为气可鼓而不可泄。

殷殷嘱托。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召见结束时刻。韩爱晶说：“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泽东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没想到，在他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泽东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毛泽东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泽东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说了一会儿，五个头头又跟毛泽东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泽东主席走了。”毛泽东这殷殷嘱托的护犊之心，我

想蒯大富要是不感激涕零才怪呢！

不骂蒯大富，难解心头气。骂得太凶了，怕蒯大富泄了气，也怕414翘尾巴。毛泽东要把分寸拿捏到恰如其分，也真够难为他的。

再说对414的态度

毛泽东派工人进校制止武斗的时候，他估计两派都不会抵抗。当周恩来向他报告在清华大学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我猜想，毛泽东第一反应肯定是414在武力抗拒。通过江青、谢富治的不断进言，以及他经常阅读“井冈山报”，在他的脑海中早已烙下了414是闹分裂的，要夺蒯大富权的，竭力挑起武斗的深刻印象。在毛泽东看来，作恶多端的414进行垂死挣扎是很容易理解的。

真要是414抗拒，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泽东早就想好了：“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竟然是团派武力抗拒工人，414真心欢迎工人。这完全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也是他无法接受的一个尴尬事实。一个“搞抬尸游行，搞炸（砸）电线，……也没有（得到）通知（的414），为什么他们欢迎？”毛泽东可能到死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是414欢迎工人，而不是蒯大富欢迎工人。这让他的颜面往哪里搁啊？所以他恼怒地责骂蒯大富：“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

因为团四两派的表现截然不同，善恶分明，所以在召见中，毛泽东对如何评论414，如何对414定性，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我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三点：

不再公允：作为领袖，对于社会上已经普遍存在的造反派分裂成的两派，虽然他内心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极少公开点评，极少公开批评。他得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但是在这次召见中，他放弃了这样的立场，连表面上的公允也不再保持了。他一再对蒯大富表态说“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不管运动中（你们）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着）你们的。”

明确定性：毛泽东明白无误地对414做了“414是反对我的”的定性。我一直在琢磨，毛泽东对414的这个定性，在内心早在半年甚至一年以前就形成了，为什么一直不说出来呢？看来他是要选择最需要、最适当的时机。这一次，414与团派的表现，反差实在太大了。已经到了“现在414高兴了，井冈山（快要）垮台了”的危急关头。他必须一拉一打，才能挺住团派不垮台，才能把414的“高兴”劲儿打下去。

软硬兼施：毛泽东说，“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对414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这种“争取群众、区别头头”的政策是分化瓦解的政策，是对待反动组织才采用的政策。一看到这样的政策，我的脊梁背就发凉！至于毛泽东说“沈如槐当副校长”，这样一根胡萝卜，似乎只关乎沈如槐个人，与414的整体命运无关。

如果毛泽东当时只说“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这句话，那么414当天就会按反动组织被取缔的。但是他还说了一些与此有点矛盾的话。他说：“要消灭414也不行”，清华要搞大联合，“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这样说来，414又好像是一个群众组织，而不是反动组织了。

这样一些可紧可松模棱两可的最高指示，如何贯彻执行，足以令在座的中央首长和学生领

袖们反复猜测、绞尽脑汁的了！

现在再通读毛泽东这篇召见讲话，他说的“那个4 1 4是反对我的”，这“反对”一词，可能并非是政治上“反党反毛主席”，性质是敌我矛盾的“反对”，而是与毛泽东文革思想、文革路线不一致，右倾保守，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对”。不管哪一种反对，在那个既极左又极端的年代，毛泽东钦定的“那个4 1 4是反对我的”罪名要多严重就有多严重。它足以把4 1 4压得顷刻间灰飞烟灭，足以把4 1 4的头头送入无产阶级的大牢！

最后说说对工人的态度

在七二七事件中，来清华制止武斗的三万工人，他们才是主角，是出了大力的，又是最大的牺牲者。

但是，这次召见，4 1 4没份儿，连工人也没份儿。

4 1 4没份儿的原因，毛泽东已经说了，因为他偏向蒯大富，所以尽管4 1 4会不高兴，他也不让4 1 4来。其实，4 1 4对领袖的安排哪敢有不高兴的胆量哦。不被召见，那是小事一桩。科学馆里的老四死里逃生了，武斗终于停止了，这些足以让4 1 4以手加额，欢天喜地的了。

倒是工人，他们挨了打，流了血，负了伤，死了人，这情况毛泽东是知情的。虽然召见中他也多次提到工人，但都是在叙事的过程中顺便提及的。只有一处，毛泽东算是比较正式地提到工人：“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5个工人，打伤工人”。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 3 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

当我听到他对蒯大富的全力支持，看到他对蒯大富落难时的流泪，觉察到他对蒯大富的一腔柔情的同时，我也痛感到了他对工人的薄情、寡情和无情，他的冷血和铁石心肠！要知道，这些工人，都是受他之命而受伤、而流血、而丧命的！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妄想以威力强大的“精神原子弹”抵御土造的却是会致命的长矛手榴弹，是那个疯狂年代的荒唐！

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那五个死难工人的躯体还没有完全冰冷，他们的亡灵正游走在黄泉路上。五个破碎的家庭正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亲人的名字。那几百名伤员正在忍受着伤痛的煎熬，有些正在手术台上与死神搏斗。要是他们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在召见的时候对蒯大富与对工人是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

因为毛泽东派出了工人，4 1 4得救了，所以，无论怎么说，4 1 4还是应当对毛泽东说一声谢的。但是，没必要感激涕零，跪拜叩谢。因为，毛泽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他的文革大局。他派工人来清华的本意是给蒯大富梯子下，替蒯大富解围的，并非是用来救援4 1 4的。4 1 4所要万分感激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三万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尽管他们也是受毛泽东之命而来的，他们毕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的救命之恩！

死难的这五位工人，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牢牢记住他们：

王松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被手榴弹炸死；  
张旭涛（北京 5 4 1 厂工人），被手榴弹炸死；  
潘志洪（北京市供电局工人），被手榴弹炸死；  
韩忠现（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被长矛刺死；  
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被开枪打死。

为什么召见时毛泽东对蒯大富、对 4 1 4、对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明白：那就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蒯大富是他疼爱的亲孙子；4 1 4 是招他嫌的野孩子；而工人，只不过是充当他“炮灰”[ 1 3 —P 3 6 3 ] 的家丁而已。

## 5、蒯大富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 错误判断

蒯大富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在作出判断之前，他也是先做了一番调查的。打电话到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找不到江青和谢富治，工作人员都没明确告诉他工人是不是中央派来的。我猜想，蒯大富认为工人要是中央派来的话，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都会预先知道的，蒯大富所深信的江青、谢富治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他的。现在，江青、谢富治都没给他信息，从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那里都得不到明确的回答，于是蒯大富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工人不是中央派来的，是 4 1 4 的黑后台伸出的黑手来镇压井冈山援救 4 1 4 来的。

另一些相反的信息并不支持是黑手操纵工人来镇压团派的。譬如，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并没有肯定工人不是中央派来的；蒯大富“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和我们是一派的。……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这些很关键的重要迹象都被蒯大富忽视了。蒯大富看到了他的好朋友鲁文阁，都没当面去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信息矛盾、局面混乱的状况下，有点吓昏了头的蒯大富顺着根深蒂固的“4 1 4 有黑后台”的思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有意思的是，韩爱晶一听到清华来了许多工人制止武斗，他在下午也跑到清华实地察看了一番。他一见人山人海的工人，马上就想到：“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他的判断与蒯大富截然相反。韩爱晶的判断其实也是一个平常百姓的判断，用不着太高的政治智慧。蒯大富是当局者迷。

让蒯大富产生错误判断的还有下面几个原因：

1、首先，正如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的，是因为蒯大富“害浮肿病”了。他自恃是文革骄子，老子天下第一，除了毛泽东、江青，谁也管不了他，他也是谁的话都不听，谁都信不过。

2、在蒯大富的思想深处，一直坚信 4 1 4 是有后台的，而且这个后台身居要职、能量极大。这个后台平时支持 4 1 4 对抗团派。现在派几万工人进清华就是这个黑后台伸出的黑手，目的就是要拯救濒临绝境的 4 1 4。

3、蒯大富亲眼见到的现实也印证了工人是被黑手操纵的：科学馆里的 4 1 4 都被工人解救出来了；一个个老团被工人抓走了；工人正在拆除团派的工事，收缴团派的武器，摧毁团派

的战斗力。

4、联想到“上柴联司”的下场，蒯大富就像是遭遇了灭顶之灾，感到“很恐怖”、“非常恐怖”。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蒯大富以及团派总部的委员们集体丧失了正常的思辨能力，连常识都没有了。

### 错误决策

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于是，蒯大富他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我猜想，当他们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面对“黑手”的血腥镇压，面对实力悬殊的强大对手，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心中必定涌起了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悲壮豪情！

错误的判断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判断毕竟只停留在认识上，错误决策是一个性质更为严重的错误。错误决策一旦付诸行动，立即会造成重大的伤亡。可以这么说，当蒯大富作出这个错误决策的时候，蒯大富本人的命运，整个团派的命运，乃至全国造反派的命运都已无可挽回的决定了！他们的前程都要被葬送了！文革历史的轨迹又一次发生转折了！

错误的判断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但是，错误的判断并不是必然会做出错误决策的。历史上歪打正着的事情很多，歪想正做的事情也并不鲜见。

假设一下，就算三万工人是被“黑手”操纵来镇压“井冈山”的，蒯大富也可以作出另一种决策：那就是不对抗，由着工人做。大不了工事被拆除了，武器被收走了，老团被带走了。即使这样，清华“井冈山”也变不了“上柴联司”。

因为，清华是在北京，离毛泽东近在咫尺，不是远在上海，更不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边陲。十万工人（这是蒯大富估计的）来清华这样的惊天大事，不出十二小时毛泽东肯定会知道，肯定会干预的。

因为，清华“井冈山”有蒯大富这样通天的学生领袖，有江青、谢富治这样靠得住的后台。“井冈山”、蒯大富，都是在毛泽东那里挂了号的。“上柴联司”怎么能与清华“井冈山”相比呢？

因为，蒯大富所看到的恐怖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怖，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蒯大富看到工人“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鸣笛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季宏也被抓走了。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工人见一个抓一个，必然会有一些肢体冲突，但是，没往死里打学生，也没打死一个学生。工人手里拿得最多的是红宝书，以及拆除工事用的铁镐之类，并没有用于武斗的武器。这与“上柴联司”被镇压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采用不抗拒的对策，蒯大富所损失的不过是工事、武器这些“身外之物”。人虽然被抓走了，但无性命之虞。只要毛泽东一句话，把人放出来，重振“井冈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至于这只把清华“井冈山”整得如此惨的“黑手”，只要蒯大富一见到谢富治、江青、毛泽

东，这只“黑手”马上就会原形毕露，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为伟大领袖除了一个隐患大害，为文革又立了一个旷世奇功，也可以出蒯大富心头的这口恶气。

即使最后知道“黑手”是自己错误的臆想，所谓“黑手”原来是一只巨无霸的红手，那也没多大关系。毛泽东向来是只注重结果，并不在意过程中的想法。蒯大富虽然没除大害，没出恶气，但是配合毛泽东停止了清华武斗，并为平息全国武斗做了贡献，这点功劳是跑不了的。

几个小时之后，已经是晚上了，蒯大富在广播台召开会议。面对“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的乱局，蒯大富坚决果断地说服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这个时候的蒯大富，无疑是理智的，冷静的。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一个正确的决策。非常遗憾的是，太晚了，晚了三五个小时。现在惨案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决策，虽然避免了此后双方更大的伤亡，但是已经不能逆转历史的进程了。

不管蒯大富判断得是否正确，只要他应对的决策是正确的，那么形势的发展会怎么样呢？让我粗线条地畅想一下：

蒯大富配合毛泽东实现了平息武斗、转入“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毛泽东对蒯大富会高看一眼。“真蠢”的评语将会被“真聪明”、“真有政治智慧”、“真有应变能力”所代替。蒯大富将位列五大领袖之首成为首席领袖。

清华两派尽管会互相指责对方是挑动百日武斗的罪魁祸首，会要求惩办杀人凶手，但是在不可抗拒的潮流面前，即使面和人不和，也得实现大联合。团派与414这对欢喜冤家、情仇弟兄还得在清华园的同一片蓝天下共生共息。

清华将很快成立以《四项协议》为基础的革委会。414经过一年多的浴血抗争，仍旧回到414分裂时候的起点。有点进步的是，沈如槐将会是众多革委会副主任中的一个。

绝大多数工人被运动着到清华转了一圈，又会回到工厂里干活。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即使要发生，也是以后的事情。各地造反派只要紧跟形势，还能在文革的舞台上再蹦跶一段时间。

蒯大富做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和清华校长，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要做九大的中央委员，亦非梦想，完全有八九分的指望。虽然此刻他还不是党员，突击入党，只不过是一纸手续而已。

唉！可惜啊可惜！我真为蒯大富在影响到团派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没有选择正确的决策而扼腕感叹！要不，七二七的惨案可以避免，团派也不至于在此时覆没。一着错，全盘输。团派的锦绣前程并不是被“黑手”蓄意破坏的（如果“黑手论”成立的话），而是被蒯大富自己“很蠢”的决策所断送的。

当然，即使蒯大富选择了正确的决策，团派、414、全国的造反派及其所有头头的命运可能会稍有不同，但是，造反派最终被逐出历史舞台，文革头头最终会被清算，文革最终必然走向失败的历史命运是不会改变的。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